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忧思与希望

第四辑

社会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忧思与希望

第四辑

社会卷



柯灵 编
关鸿 主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黄健同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四辑(1976—1999)

忧思与希望

社会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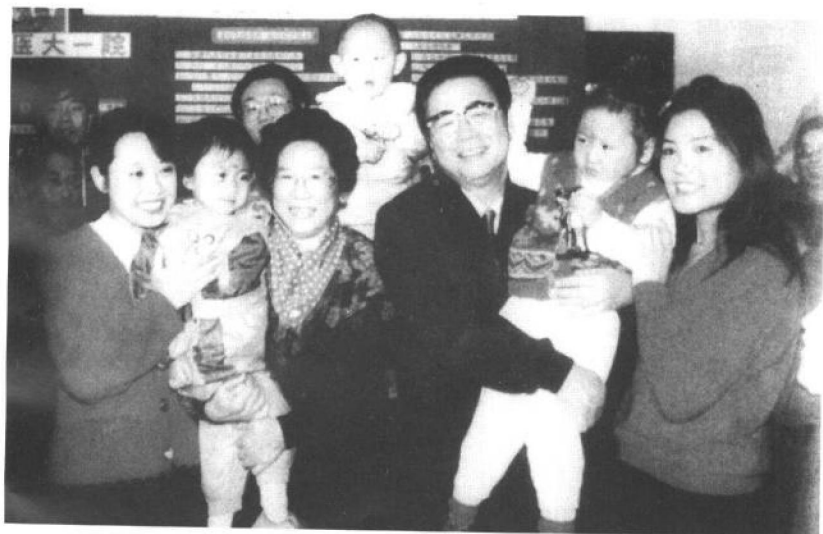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0 印张:15.625

ISBN7-80531-584-1/I·74

定价: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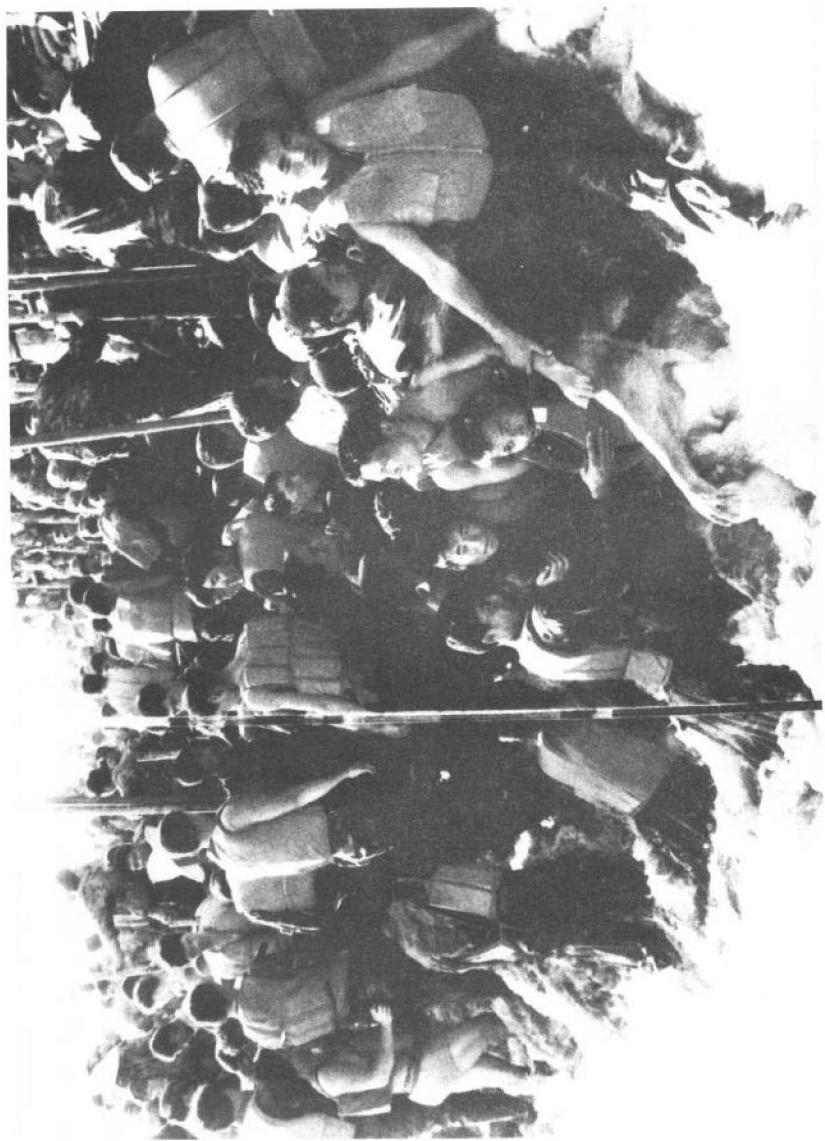


为预防小儿麻痹，江泽民总书记正在亲自给儿童喂药。



李鹏总理在任期间，十分关心消灭儿童脊髓灰质炎的问题。图为李鹏总理及夫人与孩子们在一起。

北京军区某部赴江西九江抗洪抢险的官兵，不畏艰险，与当地军民一起，誓死保卫长江大堤。图为官兵们围堵决口时的情景。





寻求再就业者急切地亮出了自己的毕业证书。



80025 75540

1996年6月29日，上海市商委在市商业职业学校举行了一次招聘会，上万名下岗失业者闻讯后蜂涌而至。



金牌的取得，是否会进一步唤起国人的“强国梦”？

满脸微笑的“空姐”与中外旅客在一起。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

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 20 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 1996 年起逐年推出,到 1999 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年初先推出第四辑六卷。年底将推出最后第五辑四卷。

编 者

第一辑

伟人与过客(1900-1949)

苦难与风流(1900-1949)

天堂与地狱(1900-1949)

东方与西方(1900-1949)

第二辑

辉煌与苦涩(1949-1966)

平凡与崇高(1949-1966)

第三辑

神圣与荒诞(1966-1976)

疾风与劲草(1966-1976)

炼狱与圣火(1966-1976)

虔诚与迷乱(1966-1976)

第四辑

挑战与抉择(1976-1999)

此岸与彼岸(1976-1999)

瞬间与永恒(1976-1999)

忧思与希望(1976-1999)

回眸与沉思(1976-1999)

人道与天道(1976-1999)

47/01

目 录

前言	(1)
干部素质忧思录	张贤亮(1)
当代中产者阶层	梁晓声(35)
北大,一个世纪的精神历程	张 良(101)
上岗下岗	陆林森(113)
“希望工程”纪实	黄传会(124)
百万“移民”下珠江	王志纲 江佐中(173)
西部在移民	麦天枢(185)
中国“空姐”回眸录	张 静(222)
万元户主	张辛欣 桑 晔(251)
“帮主”	韩 磊(257)
中国当代舞潮	张作民(281)
君子兰之谜	邓加荣(319)
长江漂流启示录	徐 辉(357)
强国梦	赵 瑜(389)
大兴安岭大火灾	杨民青 王文杰(419)
唐山大地震	钱 钢(444)
洪水之后的思考	乔林生 程文胜(478)
编后	(493)

张贤亮

干部素质忧思录

哪一层干部令人忧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及全中国人民的不幸，但这场不幸也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幸运的机缘”，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才得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在“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时刻使中国得到复兴的转机。我想，如果当时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举行公众投票选举，也未必有在各个方面比小平同志更为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历史的自然选择往往比公众意愿还准确，我这样说并不是唐突历史，唐突公众意愿，历史有历史的自然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一个需要伟大人物的时代，必然会有伟大人物产生出来。这已有 20 年的中国现实历史为证。

挑选接班人，一直是中国、东欧与前苏联共产党领袖们晚年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而此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又确凿地证明共产党领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总是阴错阳差，总是千虑一失，总是含恨而终。对接班人的选择，不管选择者有多么大的权力，最后也拗不过历史自身的选择。毛泽东花了很大心血，反复思量考验，直至不计代价地在中国搞出一场旷古浩劫，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大概仍是这件事。这是专制政体或说是民主制度不够充分发展的政体中，每一位统治者或国家

领导人逝世前无法避免的悲剧。但世界上执政的共产党领袖在挑选接班人上几经反复,也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历史鉴戒;上一代领袖没有留下好的经验,却传下了教训,可以使后人变历史的偶然性为必然性的认识。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挑选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这又是中国的一次“幸运的机缘”。所以,在中国,虽然在形成第三代领导集体方面也有过曲折和波动,但终究在小平同志生前非常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局面,不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令人鼓舞的,也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小平同志所奠定的新时代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完全合格完全胜任的领导班子,这也有近 10 年的历史为证。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以文学的语言“幸运的机缘”一句话来解释,这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形成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建国后的中国人也已到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践已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世界的知识和对本国国情的知识已达到一定深度,对处于世界潮流中的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改革、不断自我完善的认识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总之,历史已经培育出了一代新人,再加上小平同志长期治国经验和政治斗争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睿智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配以废除干部终身制给予制度上的保障,才得以形成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得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所以,本章的标题“干部素质忧思录”其“忧思”所在,并不在于高层领导人上面,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高层面和次高层面,已有足够理由让全体中国人民包括笔者放心。如果说还有一点“忧思”的话,那也仅仅是“第四代领导人”如何产生。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发展健全,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将

会有—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产生过程和交接形式，那是未来的事了，不提。

这里我所“忧思”的，主要在中层和基层干部身上。这并非“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或是与高层及次高层领导人没有接触抑很少接触而缺乏了解，因为近10年来，我国大政方针可说基本上没有失误，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也是进行前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情况。在国企改革、物价问题、经济软着陆、金融外贸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与维持全社会正常秩序等等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各个方面，高层领导的思路和决策的分寸与进度，都是把握得相当精明有序的，如果再将处理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算计在内，这已经很能说明当今领导人的素质了。尤其在国际交往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地周旋处理及有胆识、有步骤地与国际社会接轨上，更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风格与气度。当今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阶层是一群可被称为“老练的、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在国际上属于一流政治家的行列。

然而，问题也就表露在这里。在如今尚未进入法治社会而仍徘徊在法治与人治的边缘的中国，基本上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算数：“县官不如现管”！在很多方面、在不少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管”的各级各部门干部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容我提醒—下读者，我们不用仔细调查，请粗略翻阅—下传播媒体上所揭露的干部的各种不良表现，与中央领导人在国内国外大政方针上的处理两相对照，你就会发现各级各部门的许多具体领导者与高层领导人在素质上的差距；你甚至会惊奇各级各部门的许多领导者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干部素质”应该是高于—般“国民素质”的，但你不用跑远，仅就你身边去观察都会产生这样的遗憾：

并非如此！

在荷兰鹿特丹，一次国际小说家会议的间歇中，来自各国的小说家们聚在咖啡座聊天，我只能和几位来听会的中国留学生扎在一起，通过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交谈。不记得我们中国人说到一件什么难办的事，我随口说了句“那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留学生们都笑起来。外国人不知我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引得大家如此高兴，好奇地问。留学生就向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明白“现场办公会”的意思，留学生噤里嘟噜说了好些话，等他们明白了，他们也大笑，好像觉得我真幽默、真有想像力。原来他们感到好笑的是：一件本来可以由下级、中级官员当即直接办理的事，必须要高级官员亲自到“场”，把有关的下级中级官员全召集到“现场”来才得以解决，在他们听来，的确很滑稽。他们以为“现场办公会”一词是我的即兴创作，是我随意发明的，哪里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早已制度化地成为解决问题的办事方法和会议形式。

这种中国特有的“现场办公会”，就很能说明中国一般办事官员的素质。为什么非要等到开“现场办公会”才能立竿见影地办事呢？

犯罪成本论

我从来不将“素质”问题单纯地看作个人道德品质和教养问题，“素质”是在制度、环境、历史中形成的。

譬如，现在干部廉政问题被当成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一般老百姓总以为抓出级别越高的贪官污吏就表明抓廉政抓出了成效，抓出的官越大越过瘾，就“人心大快”。而我却相信级别越高的干部越少有违法犯罪的可能，如果人们将目光专注在抓高级干部中的贪官污吏上，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总以为“反腐败”还没反彻底，

或是只有抓了不少“大老虎”出来才证明“反腐败”反彻底了。我担心这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反腐败”的一个思想误区：抓几个“大老虎”出来，反腐败也就大功告成。

我对高层官员的信任和做这样的分析，也决不是从高级干部的个人道德品质和教养上去推断，更没有一点维护他们的意思。我的看法是：抛开个人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品质、教养程度在犯罪动机上起遏制作用的因素不谈，犯罪，是需要付出“犯罪成本”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个正常人都很会算计个人利益的得失，能做到高级官员，更不会是傻瓜。人人都懂得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干部的级别越高，要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越高，二者成正比地上升。

郑也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表面看来，我们的高级公务员的货币收入与普通公民相差无几，但是若加上专车、专职司机、宽敞的住房、特殊的病房、保健医生、警卫，以及司机、警卫的住房，折合货币收入，实际上，我国高级公务员的收入恐怕可同发达社会的高级官僚比肩。”郑也夫先生还没有将秘书、家庭佣工等等高级公务员的卫星系统说全，如再加上出国机会与货币含金量的差异，那就更为可观。历史上一直有“高薪养廉”的说法，我们的高干已经达到了“高薪”，这就具备了“廉”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说有了基本条件就人人皆“廉”，但毕竟是一个保证。这是其一。

其二，个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和随之而产生的权威感、成就感及受人重视尊敬的感觉，即构成人生价值取向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很重要的个人无形利益，很多人追求这种人生价值的体现比对物质享受更加重视。要犯罪，这些无形利益立即转化为“犯罪成本”中非常巨大的资本投入，头脑正常的高级干部在非法货币物质收入面前，是绝对要掂量利弊得失和风险程度的，只有个别思想意识极为恶劣或心理变态的高级干部才会利令智昏，丧心病狂。

其三，以上所说的一、二，即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对每一个拥

有者都会是一种实际的心理制约，所拥有量越大，则心理制约越强。就拿我们这些常会放浪形骸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有这种感觉，稍稍有点名气马上不自由起来。所以中国民间有“无官一身轻”、“为人别当官，当官不自在”等等谚语。

而中、基层干部官员尤其数量最大的基层干部却较少有这种约束力，在公务员工资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要违法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相对较低。如果一次违法犯罪用“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是合算的，风险程度不大的，就足以诱惑人去冒一次险。一次冒险成功，就难免不让人继续冒险，而中、基层干部由于所掌握的权力有限，每次的“交易额度”不会太大，屡次冒险皆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较高。

“权钱交易”现象开始时，也会遭到公民们包括买方当事人的不齿、不满和谴责，但“交易额度”较小，在“权钱交易”中，用各种形式、方式、花样、渠道付费的买方也有很大收获（不然便不会发生交易），更重要的是买方的收获通常会大大高于付出的费用，因为官员手中的权不用官员本人花多少力气，既不用“十年寒窗苦”下功夫读书，又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要花本钱四处“竞选”，所以，“权”永远是“贱卖”的。这样，付费的买方也认为很“值”，极少有买方抱怨其交易所得而跑到检查机关揭发的事，于是不良性就会逐渐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变为正常性，最后被社会普遍承认。一般人会根本忽略这种现象是“腐败”、是“违法”、是“犯罪”，交易双方都心安理得。常此以往，蔓延开去，便自然而然逐渐衍化为社会风气。

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

1996年《参考消息》上发表过世界银行一项对亚洲各国及地